

從新文化到新文化史： 史語所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淵源、 變遷與展望

李峙線*

本文將史語所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歷程劃分為四個階段，亦即：1928-1950、1950-1975、1975-1995、1995-2020。透過考察創所以來先進在思想文化史領域的耕耘，本文試圖強調以下三點：第一，傅斯年並未把思想文化史排除於實證史學的課題之外，他認為，實證方法也可以研究主觀精神世界。第二，史語所不重視思想文化史的形象是戰後戒嚴政局下的產物，與 1950-1960 年代自由主義文化激進派與文化保守派的論爭密切相關；事實上，所內持續有思想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三，1980 年代以來，史語所在思想文化史領域的開疆拓土，不單是順應歐美學術風潮的結果，而與傅斯年的史學革命，在文化態度與學術方法上有相當的承繼關係。在文末，本文也簡述近年來本所思想文化史領域研究同仁在知識史與跨境文化交流兩課題上的新嘗試與新成果。

關鍵詞：思想文化史 實證學派 文化激進主義 考據與義理之辯 中國現代化
新文化史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文化思想史研究室召集人

一·前言

「史語所擁有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傳統嗎？」在李貞德所長交付回顧文化思想史研究室之歷史的重責大任後，我拿著這個問題，請教了所內多位師長。¹ 大家對於這個問題的初步回覆，多半是否定的。傅斯年強調建立客觀、實證的科學史學，以至於史語所的強項在於考古發掘、文字訓詁、制度考證與民俗調查，相較之下，抽象縹緲的哲學義理與主觀精神世界，當非史語所原訂的研究範疇。有趣的是，細談之下，當我們檢視個別研究者的學術經歷，便發覺這個印象未必精確。所內數代前輩們或許在專業研究上並不以思想文化史著稱，但許多人確實對這個領域深感興趣甚至留有作品。傅斯年的《性命古訓辨證》就是很好的例子。正因為對此議題的普遍印象與個別事實間的落差，我決定擴大本文的研究範圍，不以研究室成立的1995年為始點，而從新文化運動所啟發的實證學風談起，討論：1. 以傅斯年為首、在文化上追求激進西化、學術上宗法科學的「實證學派」² 對於中國思想文化史研

¹ 王汎森、王鴻泰、杜正勝、陳正國、陳弱水等所內五位師長就這個問題對我分享了他們寶貴意見與訊息，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的周婉窈與楊肅猷先生也就戰後臺灣的知識氛圍提供重要的看法，在此表達我的由衷感謝。再者，也感謝陳正國先生慷慨提供即將付梓之大作《什麼是思想史？》的文稿，讓我對這個領域有更完整的認識與意識。當然，以下的討論，是我個人的綜合與詮釋後之結果，不代表他們會為我的淺見背書。本文曾發表於史語所九十五周年所慶研討會，感謝評論人呂妙芬先生的精闢建言及與會者的寶貴意見。此外，感謝我的助理王彥翔同學在資料蒐集與文字校對上的協助。

在著手撰寫本文以前，王鴻泰與呂妙芬先生已詳盡論述1980年代以來臺灣學界在思想文化史領域的具體成果。在他們建立的基礎上，本文的目標是透過拉長時間維度、從更廣泛的政治社會氛圍，並聚焦於史語所研究工作，來理解兩位先生所勾勒的學風變遷；至於這個領域更確切的研究成果，仍請讀者參考兩位先生的大作：Hungtai Wang, “從經國濟民到聲色犬馬——二十年來臺灣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Ming Studies* 63 (2011): 18-37; 王鴻泰, 〈從骨骼到血肉與精神的發育：四十年來(1980-2020)臺灣明清社會史的回顧與展望〉, 耿立群主編, 《深耕茁壯——臺灣漢學四十回顧與展望》(臺北：國家圖書館, 2021), 頁285-333; 呂妙芬, 〈臺灣漢學四十年——裂變與跨界的思想史研究〉, 《深耕茁壯——臺灣漢學四十回顧與展望》, 頁335-368。

² 為行文之便，本文一律採用「實證學派」指稱傅斯年及其「科學史學」為宗、在戰後集中於史語所與臺大文學院任職的史學研究者，他們有時也被稱為「史料學派」。此外，在描述實證學派的文化立場時，本文用「文化激進主義」，來指稱他們追求全盤西化、全面檢討中國傳統的立場；這個詞彙是沿用余英時先生的說法。余英時口述，李懷宇整理，《余英時談話錄》(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2021), 頁259-261。另參余英時,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

究的立場；2. 此立場如何在戰後臺灣肅殺的政治與社會局勢中修正調整，促成史語所排斥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形象；3. 在 1980 年代以降，史語所又如何搖身成為引領中文學界思想史及新文化史風潮的領航者。

在追尋史語所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傳統前，馬上面臨的問題是：甚麼是「思想文化史」？要抽象定義「思想文化史」的方法與範疇幾乎是不可能的。在西方，「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 等研究領域在二十世紀史學思潮中前仆後繼，抽離學說承繼與社會脈絡，便難以掌握該取徑之要旨。同理，在中文世界，不同時空的不同史家對於「思想文化史」多半有不同的理解；企圖為該詞尋求一個普遍可接受的抽象定義，無疑是緣木求魚。因此，應先予聲明的是，以下對於「思想文化史」一詞的界定，只是為了限制本文的討論範圍，並突顯史語所研究歷程的一些特質，而不預設這樣的界定為學界共識或具有更普遍的意義。

本文所討論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大致有以下三個特質或疆界：

- (一) 其研究的對象是歷史上的文化精英。此處的文化限於「雅文化」(high culture)，排除「俗文化」(low culture)，也不泛指整體社會生活模式。而所謂文化精英，係指其思維經過一定的學習與訓練，而對於生命與世界的本質及目的有一套體系性、理論化的設想，並在這個框架的指引下，形成一系列的問題探索與行動。思想文化史首要關心的是這群人的主觀內心世界，包括他們就嚴肅義理的演繹與論辯，但也可以涉及他們對於日常生活乃至聲色犬馬的態度。
- (二) 在問題與方法上，思想文化史研究試圖從歷史的脈絡，來認識文化精英的主觀世界及其變化；它的核心問題是，特定概念與思維取向的淵源、發揚、流變及其與時空脈絡的關聯。至於評價該主觀思維的真偽、好壞，則非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關懷所在。再者，訓詁、校勘與體例考辨都可以是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手段，但若研究的目的就止於考訂語詞的用法與意義、語法的邏輯、著作的作者與版本、事件的時序與地點，而非以探求思想者的歷史經驗與主觀世界為目的，則不算是本文所關注的思想文化史研究。
- (三) 基於上述定義，宗教史、醫療與科學史、藝術史研究等三個次領域當可納入

的激進與保守》，《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2017），頁 209-251。

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範疇；然而，由於中文學界與史語所內特殊的學術發展理路，這三個領域與思想文化史研究關係較遠（前兩者比較是社會史傳統下的產物，後者則與考古、人類學傳統相關），故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根據以上界定，本文將史語所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歷程劃分為四個階段，亦即：1928-1950、1950-1975、1975-1995、1995-2020。透過考察創所以來先進在思想文化史領域的耕耘，本文試圖強調以下三點：第一，傅斯年並未把思想文化史排除於實證史學的課題之外，他認為，實證方法也可以研究主觀精神世界。第二，史語所不重視思想文化史的形象是戰後戒嚴政局下的產物，與1950-1960年代自由主義文化激進派與文化保守派的論爭密切相關；事實上，所內持續有思想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三，1980年代以來，史語所在思想文化史領域的開疆拓土，不單是順應歐美學術風潮的結果，而與傅斯年的史學革命，在文化態度與學術方法上有相當的承繼關係。在文末，本文也將利用簡短篇幅，說明近年來本所思想文化史領域研究同仁在知識史與跨境文化交流兩課題上的新嘗試與新成果。

二·1928-1950：新文化運動、實證史學與思想文化史研究

傅斯年所標榜的實證史學並不排斥思想文化史研究。事實上，正如余英時在史語所七十周年研討會指出的，由胡適、傅斯年等人所領導的中國現代史學革命，恰恰「是從中國古代哲學史或學術思想史的研究開始的」。³ 這個取向並非偶然，而與他們更宏大的文化改造目標息息相關。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傅等人認為新中國的未來有賴於科學文化的生根發芽，而這個文化啟迪的事業必須從文化領導階層的革新開始。⁴ 於是，從知識上挑戰學院內保守派文化領袖的霸權，成為他們首要的工作目標。他們所喊出的一系列學術口號，從整理國故、古史辨到實證史學，在相當程度上，都劍指以章太炎為首的文化保守主義者，欲從後者手中奪取對

³ 余英時，〈學術思想史的創建及流變——從胡適與傅斯年說起〉，《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頁2。

⁴ 胡適與傅斯年認為，在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上，群眾啟迪、政治參與甚至教育工作皆不如現代學術之建立來的關鍵。當然，隨著1931年以降中國政治問題的日益嚴峻，傅斯年不再堅持這樣的立場，甚至在晚年自責，他們與現實政治、教育保持距離的傾向，間接致使大學生的普遍左傾。

古今中國文化的詮釋權。而他們的激進戰略，是正本清源地回到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以科學方法，建立新的典範論述。⁵

可以肯定地，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就是貫徹傅氏學術生涯的核心關懷。1926年底，傅斯年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返國，隔年在該校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其機關刊物《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的創刊，係以傅斯年與顧頡剛針對一個文化思想史議題——戰國時期世界觀與秦漢統一之關聯——的辯論開展。⁶ 在其後數年，傅斯年固然在結合歷史學與人文地理學上有卓著貢獻，而撰有〈夷夏東西說〉等經典之作；但他多數的研究與教學成果，都環繞著古代中國的思想文化課題，包括先秦思想的社會條件、中國文學之演化、古代神話的社會與思想背景等議題。⁷ 而1938年完稿的《性命古訓辨證》可說是藉由語言學分析，總結了他對儒學思想發展史的看法。

對於傅斯年來說，科學的語言學 (philology) 與思想史是一體的兩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開宗明義指出：「本來語言即是思想，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語言學總是一個大題目，而直到現在的語言學的成

⁵ 本文對於陳寅恪的思想文化史研究略而不提。一方面，陳寅恪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之著作集中於敦煌學、民族學、佛學等領域，與本文所關注的「思想文化史研究」，關聯較遠。他在思想文化史領域的代表性作品，則多成於他選擇不隨史語所遷臺之後，如《元白詩箋證稿》(1950)、《柳如是別傳》(1965)。另一方面，他的史學方法與對於中國傳統的態度皆獨樹一幟，與傅斯年的學術與政治立場有顯著不同，也與本文的核心關懷——實證學派與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關聯——有所距離，不易整合於本文的脈絡討論。在所慶會議上，呂妙芬與王鴻泰先生特別提醒，未處理陳寅恪的史學是本文的一大弱點。然而，基於前揭理由，加之我自認無力在有限篇幅中討論陳氏深刻廣博的論著，決定仍不將其納入本文討論。不論如何，本文只是試圖提供一種理解史語所思想文化史研究軌跡的觀點，無欲宣稱這是可以概述九十五年來一切發展的定論。

⁶ 顧頡剛，〈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1.1 (1927)：1-7；傅斯年，〈評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1.2 (1927)：18-20。

⁷ 在1928到1938年間，傅斯年的思想文化史相關論著、課程資料包括：傅斯年，〈詩經講義稿〉，收入傅樂成編，《傅斯年全集》第1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戰國子家敘論〉，《傅斯年全集》第2冊；〈史記研究〉，《傅斯年全集》第2冊；〈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傅斯年全集》第1冊；〈周頌說——附論魯南兩地與詩書之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 (1928)：95-112；〈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一個短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 (1930)：227-230；〈誰是「齊物論」之作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 (1936)：557-567；〈天問之史料性〉，《古今論衡》1 (1998)：109-124。

就也很能副這一個大題目。」⁸ 換言之，語言是思想的展現，語言學是論斷中國思想史的試金石。

在中國古代思想史領域，語言學方法尤為重要。於 1926 年留學返國前夕，傅斯年在寫給胡適的一封信中，批評後者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仍是自上一時寫下來，不是自上層（下一時）揭到下層（上一時）。……我們經子的定本，都是漢朝人給我們的，加上了一個很很的外型。勢非把自秦至漢中季一段故事弄清楚，我們不能去自由用經子的材料，用則入陷阱。

因此，必須先透過科學的語言學來辨偽、梳理材料的時序，才可能往下談古代思想的演變。⁹

就傅斯年對於語言學與中國古代思想史的重視，李濟的詮釋應當是中肯的：

假如說他有所愛憎，為他所偏愛的就是「科學的語言學」……講歷史，歸根總要講到思想史；講到思想史，原始的材料就是語言，這一中心觀點不但解釋了歷史與語言的研究為什麼分不開，由此也可以看出，蘊藏在他的內心最深密處為他最關切的學術問題，實是中國民族文化的原始階段及其形成的主動力量。¹⁰

不過，從高唱客觀實證方法到獻身於古代主觀精神世界之研究的作為，恐怕並不如李濟詮釋地那麼理所當然。首先，在傅斯年欣賞的歐洲實證主義研究中，不論是英、法、德的典範，均不以研究思想文化史見長。¹¹ 傅對於後者的興趣，應該不是來自實證主義的啟發。再者，傅斯年所擊劃的「科學的東方學」是要從地理環境、物質生活、族群關係、文字、民俗與方言等各方面來重新書寫中國古史；在這個以實證主義為指導方針的計畫中，思想文化並沒有顯著的地位。他所聘用的研究員，也甚

⁸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28)：1。十年後，傅斯年在《性命古訓辨證》說得更明白：「思想不能離語言，故思想必為語言所支配，一思想之來源與演變，固受甚多人文事件之影響，亦甚受語法之影響。思想愈抽象者，此情形愈明顯。性命之談，古代之抽象，思想也。吾故以此一題為此方法之試驗焉。」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收入《傅斯年全集》第2冊，頁501。

⁹ 傅斯年，〈致胡適(1926.08.17)〉，收入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編，《傅斯年遺札》卷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頁46。

¹⁰ 李濟，〈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所長紀念特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1），頁11-19。

¹¹ 傅斯年所提到的歐洲實證主義研究代表，包括英國的 Henry Buckle 的英國文化史，法國的人文地理學派，與德國的 Mach；三者無一以思想文化為主要研究領域。

少以思想文化史為專長。¹² 可以說，傅斯年個人關注的思想文化史與他所組織的集眾實證研究，兩者其實有一定距離。要解釋傅斯年何以不尋常地結合實證史學與思想文化史研究，還是必須回到新文化運動與國粹派的對話脈絡。

在改宗文化激進派以前，傅斯年曾有一段「崇信」章太炎學說的經歷。¹³ 日後，不管對於「國學」或「國粹」，傅斯年顯然都帶著一種佛洛伊德所謂的弑父情結。¹⁴ 傅斯年的思想文化史興趣，當與他青年時期在北大本科國文門受到的薰陶密切相關；而成熟的傅斯年反常地要以實證方法研究中國思想，則是要向昨日之我及思想上的父親——固守「人尸學問」的章太炎——徹底決裂。¹⁵ 令傅斯年不能接受者，是國學之說將學術研究與道德說教混為一談，進而恣意地神秘化、神聖化中國的心性思想，以「精神文明」、「內心生活」等誤導性說法，妄想中國可以自外於現代化之浪潮，既扭曲歷史，又阻礙社會進步。¹⁶ 相反地，傅斯年的實證思想文化史研究是要建立一個嚴格區分歷史事實與道德關懷、區分求真與論道，同時祛除中國心性傳統迷謬的學術典範。¹⁷ 是故，他在〈旨趣〉中一再地強調：

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

……果然我們同人中也有些在別處發揮歷史哲學或語言泛想，這些都僅可以當作私人的事，不是研究所的工作。

……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氣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¹⁸

¹² 在傅斯年領導下的史語所，專攻思想文化史者，可能只有陳寅恪、容肇祖、王明。三人皆未隨所遷臺。

¹³ 毛子水，〈傅孟真先生傳略〉，《自由中國》4.1 (1951)：16。

¹⁴ 關於傅斯年思想之矛盾性的深入討論，見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頁 57-65。傅常提及對於佛洛伊德思想的喜愛，但未申述理由。佛洛伊德對於弑父情結的分析與傅斯年對於傳統與國學的愛恨交織間的相似性，或許是原因之一。

¹⁵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頁 4。

¹⁶ 毫不意外地，傅斯年也輕視接受國學之說的錢穆及其思想史著作。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頁 202。

¹⁷ 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第四章；王汎森，〈王國維的道德團體論及相關問題〉，《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三聯書店，2014），頁 156。

¹⁸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頁 3, 8, 10。

李峙線

傅斯年不是反對思想文化史研究，只是希望以實證主義方法排除心學與史學交雜之弊，建立歷史學的學科自主性。

從歐洲史學的角度，結合實證主義與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做法固然是怪誕的，但回到 1920-1930 年代的中國學術脈絡，這樣的取徑確有相當的合理性。由於從史學論述「越界」到道德說教，並將議論者主觀強加於歷史事實的反實證路數，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重大障礙，又由於這樣的路數最容易發生在思想文化史研究，則實證式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不啻為對症下藥之舉。¹⁹ 那麼，下一個問題是，在傅斯年身後、1950 年代以降的臺灣，史語所為何會被貼上反對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標籤？

三· 1950-1975：考據與義理之辯和史語所「無思想性」的起源

在戰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史語所被外界認為閉塞於考據學問，而拒義理、思想文化史研究於門外。這個形象的廣植人心，可以在徐復觀、沈剛伯、林毓生、余英時、李永熾等所外思想史學者的言論中得到驗證。²⁰ 尤其，徐復觀在 1950、1960 年代對史語所進行了一系列極富煽動性的攻訐，或許直接促成了這個印象。在 1967 年給李濟的一封公開信中，徐氏厲聲指控：

在你們把持之下，使對孔、孟、程、朱、陸、王的研究工作從來不能進入中央研究院。……我勸您：中央研究院應成立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單位。您立即頂住說：「我們不研究禪宗這類的東西。」……當時我告訴您，禪宗在中國文化史上發生過這樣大的作用，站在「史」的立場，為什麼不可以研究？日本人研究它的很不少。您說：「日本不會有公家學術機構去研究。」這完全是閉著眼說話。²¹

¹⁹ 此立場又關係到康梁以降的一個更基本的預設：中國現代化必須先從思想文化的變革開始。關於心性之學與此預設之關聯的分析，見林毓生，〈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思想與人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頁 151-172。

²⁰ 徐復觀，〈致李濟之先生一封公開信〉，《徐復觀雜文補編》（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第 2 冊，思想文化卷（下），頁 336，原刊於《中華雜誌》，第 5 卷第 5 期、第 6 期，1967.05.16, 1967.06.18；沈剛伯，〈史學與世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0（1968）：509-517；李永熾，《邊緣的自由人》（臺北：游擊文化，2019），頁 358-360。關於林毓生與余英時對實證學風的批評，詳下第四部份。關於戰後臺灣史學界的整體狀況，見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下冊》（臺北：唐山出版社，1996），頁 242-273。

²¹ 徐復觀，〈致李濟之先生一封公開信〉，頁 336。就同樣的主題，徐於隔年又向中研院院長

徐復觀批評，因為實證學派的「師承」，

歷史語言研究所為「無思想性」之學術機關；他們常常把「思想」與「科學」對立起來，所以他們所提出之人文科學方面之院士，盡為無思考能力之院士。他們數十年來皆守此為學術之正統，實則阻塞通向一切學術之門。²²

然而，如前所述，對傅斯年來說，並不存在思想（史）與科學的二元對立；那麼，究竟史語所在李濟的領導下（1955-1972），是否真如徐氏所言，轉以科學之名，拒斥思想文化史研究？或者，這樣的形象是出於外界的誤解或刻意扭曲？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有必要從 1950、1960 年代思想界的整體氛圍談起。

大體而言，戰後的臺灣思想界延續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格局，主要的關懷繼續環繞著傳統文化在中國現代化之路上的角色，而意見的兩端同樣是追求全盤西化的文化激進主義者與頌揚固有國粹的文化保守派。²³ 不同的是，在國共對峙與白色恐怖的氛圍下，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更接近於共產主義者的文化激進派，開始在公共議論上有更多顧忌，論述轉趨守勢；相反的，同情理解傳統文化、追求中西融合的「新儒家」，則是站在政治正確的一端，批判實證學派的反傳統立場、要求受傅斯年餘蔭的文化激進主義者交出學術資源。²⁴ 正是在這樣的框架下，爆發了 1956-

寫了一封公開信。見徐復觀，〈寫給中央研究院王院長世杰先生的一封公開信〉，收於氏著，《徐復觀文存》（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頁 260。感謝王鴻泰先生提醒我徐復觀曾寫過這些信。

²² 徐復觀，〈致李濟之先生一封公開信〉，頁 337。我沒有查到李濟對於這封公開信的回應。

²³ 戰後文化激進派領袖包括：胡適、雷震、李濟、殷海光、張佛泉、毛子水；文化保守派則以章派、黃侃在師大的門人為代表，包括高明、林尹。在兩個極端中間，則是文化保守但在政治上追求西方民主的新儒家。錢穆的立場雖偏向文化保守，但與章派、新儒家皆有距離，而且在學術上錢與文化激進派有不少共識。在下述論戰後期，錢穆與徐復觀也有辯論，但為免節外生枝，此處暫略而不提。關於錢穆史學與民初各學派之關聯，參見王汎森，〈錢穆與民國學風〉，《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20），頁 175-222。關於 1940、1950 年代，文化激進派內部的政治思想變化，參見陳弱水，〈殷海光與 1940、50 年代的自由主義——殷海光歷史位置的一個探討〉，《思與言》60.3 (2022)：10-61。

²⁴ 當然，徐復觀也支持民主、也批評國民黨專政。但相較於延續胡、傅立場的文化激進派，新儒家的折衷路線——認為中國可以在政治與文化上走出一條兼容傳統的現代化之路——更能被當局接受。1960 年，文化激進派所支持的《自由中國》被取締後，徐復觀及其主編之《民主評論》未受波及；1961 年底，胡適去世前夕，徐復觀響應國民黨發動的批胡聲浪，為文大罵胡擔任中研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是東方人的恥辱」。這些事件在反映徐與國民黨政權的親近、默契，甚至是「合作」關係。這是余英時的論斷。余英時，〈《民主評論》新儒家的精神取向——從牟宗三的「現世關懷」談起〉，收於彭國翔著，《智者的現世關懷：

1957年的考據與義理論戰。

1956年10月,《中央日報·學人副刊》在羅家倫、李濟等新文化運動世代知識分子的支持下創刊。接下來,這份以「喚起學術的興趣促進思想的交流」為目標的通俗刊物,出版數篇由史語所、臺大文學院學者撰寫、帶有重申實證史學意味的文章。²⁵ 他們的說法引起以徐復觀為首的新儒家學者不滿,進而激起一系列申辯考據學與義理學之關聯的筆戰。²⁶ 以史語所與臺大文學院學者為主的文化激進派——實證史學陣營,包括李濟、勞榦、毛子水等人,大致有兩方面的主張:第一,他們重申,隨著科學方法的進展,可以用客觀的證據來研究歷史上的主觀精神生活。例如,李濟樂觀地表示,二十世紀以來,科學方法最重要的進展在於「把人類文化的研究推進成為歷史學的主要課題」,尤其,「各民族及其代表人物最主觀的觀念,也可以當著客觀的資料研究。」²⁷ 同理,勞榦主張,「宋儒義理當然可以當作學術史的材料來研究……做學術史及思想史的人,雖然應當明瞭〔宋明理學的〕內容,卻不必具有任何的信仰……。」²⁸ 換言之,實證史學運用客觀、外在證據即足

牟宗三的政治與社會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頁23-34。另參黃克武,〈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的糾結:1950年代港台朝野的五四論述〉,《思想史》9(2019):217-264;蘇瑞鏘,〈《民主評論》的新儒家與《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關係變化初探:以徐復觀與殷海光為中心的討論〉,《思與言》49.1(2011):7-44。

²⁵ 羅家倫,〈喚起學術的興趣促進思想的交流——為學人創刊而寫〉,《中央日報》1956.10.02,第六版(《學人副刊》第1期)。

²⁶ 文化激進派——實證史學陣營的文章包括:李濟,〈試論中國文化的原始〉,《中央日報》1956.10.02,第六版(《學人副刊》第1期);勞榦,〈歷史的考訂與歷史的解釋〉,《中央日報》1956.11.06,第六版(《學人副刊》第6期);毛子水,〈論「考據」與「義理」〉,《中央日報》1956.12.04,第六版(《學人副刊》第10期);勞榦,〈論中國國故學上的分工〉,《中央日報》1957.01.22,第六版(《學人副刊》第17期);毛子水,〈再論「考據」與「義理」〉,《中央日報》1957.03.12,第六版(《學人副刊》第24期);張春樹,〈論義理與考據之爭〉,《中央日報》1957.08.06,第六版(《學人副刊》第29期)。徐復觀——義理派陣營的文章主要包括:徐復觀(筆名李實),〈兩篇難懂的文章〉,《民主評論》8.1(1957):3-9;徐復觀(筆名李實),〈答毛子水先生的「再論考據和義理」〉,《民主評論》8.8(1957):9-15;陳拱,〈論考據與義理的關係以及義理之驗證(上)〉,《民主評論》8.22(1957):540-42;陳拱,〈論考據與義理的關係以及義理之驗證(下)〉,《民主評論》8.23(1957):579-582;徐復觀,〈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上)〉,《人生》169(1957):2-5,24-25;徐復觀,〈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下)〉,《人生》170(1957):8-15;萬先法,〈考據、義理與學術精神〉,《民主評論》8.24(1957):11-7。

²⁷ 李濟,〈試論中國文化的原始〉。

²⁸ 勞榦,〈論中國國故學上的分工〉。

以呈現古代精神生活，同情的理解不是史家必要的技藝。而就使用客觀證據的方法而言，他們認為，傳統的考據學與現代的科學在原理上是一致的。毛子水乃主張，考據學應被視為思想文化史研究之本，因為客觀的考據成果是探究主觀義理演進的基石。

然而，毛的說法只是順著國學傳統的分類而論，實則無意回到儒學正統之爭，重振漢學、貶抑宋學。文化激進派的真正目標——他們的第二個主張——是要依現代學術框架來重新分割國學的傳統部門，進而將傳統義理學排除於現代學術之外。詳言之，他們主張，「國學」不是現代學術下的一個學科，考據與義理也不該繼續被視為此一學科的兩種方法。相反的，他們指出，在現代學術分工的框架下，這兩種學問應該被劃歸於不同的兩個學科範疇。根據毛子水的定義，考據學是關於「史傳記載的徵實和辨證」，「是屬於語言和歷史〔學〕範圍以內的事情」；而義理學是「人生哲學的研討」，是「哲學的一支流」。²⁹ 勞榦更激進地指出，傳統的義理之學其實超出現代學術的範圍：

宋儒義理不僅僅只是哲學，同時還帶著「為天地立心，為民生立命」的宗教信仰和抱負，也就自然不必純用學問的眼光來看待。我們過去的習慣，既已用義理二字專指宋明理學，而宋明理學並不完全是一個讀書的學問，而所謂「義理」，並不和學術思想的研究意義完全一致。³⁰

而在後期加入論戰，當時甫自臺大畢業的史語所助理員張春樹則補充道：

現在中國義理學的研究應當採取一種整理的態度，因此第一要義便是要把我們的義理學中的一切命題和論斷加以批判的研究，確定其「真」「偽」。……譬如說，「性」到底是善是惡或本無善惡之分？我們就可以利用華真 (J. B. Watson) 等人有關行為心理學實驗的結果把孟子、荀子、告子等人的學說加以批判。經過這樣的批判在一個純研究者來說才算是完成了他的工作，這是現代哲學研究的特色……。³¹

傳統義理學的知識方法與態度固然不該被現代學者沿用，但卻可作為現代哲學的研究對象，而具體的工作內容是用實證方法、不涉主觀地檢驗、批判各義理命題的真偽。

²⁹ 毛子水，〈論考據與義理〉。

³⁰ 勞榦，〈論中國國故學上的分工〉。

³¹ 張春樹，〈論義理與考據之爭〉。

與此同時，他們認為，歷史上的義理論辨亦可為現代史學的課題，但研究者同樣應嚴守價值中立的原則。例如，毛子水解釋道，

如果有人在一個學校裡開一門「宋明理學」的課，那他主要的題目必是闡述宋明儒者學說的原委……要闡明人家的理學，自然只能根據人家的言行。換句話說，普通功課表上稱作「宋明理學」的，應即是「宋明理學家的思想史」或「宋明理學發達史」的簡稱。如教書的人把他看作「依用宋明理學的方法以治哲學」來發揮自己的主張，那恐怕就認錯題目了。³²

綜言之，在他們的重新界定下，作為方法的義理學應被排除於現代學術之外；而作為研究對象的義理學，不論研究者處理的是義理學說在哲學上的真偽或義理學說在歷史上的發展軌跡，研究者都應避免其個人的主觀價值影響其推論。

如此，將史語所、臺大一方的立場化約為「考據派」並不公允。一方面，他們在根本上反對考據與義理學的傳統定義，欲從「領域」而非「方法」來重新定義這兩門學問；另一方面，他們的議論重點是闡明以實證主義研究思想文化的兩個方法論原則：第一，歷史上的主觀思想可以藉客觀材料證明，對該立場的同情理解並非必要。第二，研究者應以價值中立的態度研究歷史上的思想文化，尤其不能採取「以史證道」的學術立場。這兩個主張都已經遠離了考據學所代表的目標與方法，「考據派」的標籤實在是對手的刻意曲解。³³ 更重要的是，如果說他們反對「義理學」，那是指他們反對傳統義理學不加以區別事實與價值的取徑方法，而不是反對以傳統義理為研究課題的思想文化史研究。

平心而論，這些方法論上的聲明，涉及中國學術傳統、實證主義與詮釋學之歧異、人文科學的價值中立等複雜議題，實在不可能在大眾刊物上用有限篇幅作周全論證。³⁴ 徐復觀為此在《民主評論》、《人生》雜誌上發表數篇言詞辛辣、論述繁瑣

³² 毛子水，〈再論「考據」與「義理」〉。張春樹則謂：「不過那先輩證明錯誤和無意義的看法，卻仍留在我們的思想史上，因為這可以說明和提醒我們在那個時代曾有人想過這些問題，雖然它們沒有想對，但卻為我們開創了路；而且沒有一個人的想法會百分之百的對，人類整個文化便是一個『試誤』的累積。」張春樹，〈論義理與考據之爭〉。

³³ 張春樹，〈溫舊業、念恩師，附論民國史學——憶史語所學習研究的日子〉，《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990-991。

³⁴ 《學人副刊》以三千字內之文稿為原則。實際上，關於上述實證主義與人類主觀生活之研究的兩個原則，也是十九世紀末以來，歐洲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費盡心思欲澄清的問題。僅韋伯一人就長篇累牘地討論這兩個問題，可見問題本質的艱澀。再者，處於現代與傳統文化交

的攻擊，當中有合理的質疑，但也不乏吹毛求疵之處，在此無須一一細究。³⁵ 況且，在根本上，徐氏反對的是史語所、臺大學者的反傳統立場。他以重振中國傳統文化為要務，而認為在學院內提倡傳統義理之學，將有助當代對於傳統文化的認同與實踐。也就是說，他不在意現代學術對於價值中立的要求；他對於義理學的肯定，正是因為它能從理性思辨推導信仰與行動方針的取徑。³⁶ 如此，可以說，兩派對於學術活動的本質與規範有南轅北轍的預設，對話的空間自然非常有限。而徐動輒訴諸集體民族情緒，大罵對手圖謀「打倒中國文化」、具有「由卑賤感而來的自虐狂」心態等言論，除了反映雙方對話之不可能，也透露了這場論辯的政治性。³⁷

不過，不可否認，徐復觀確實提出了一個對實證史學極具威脅的觀點。他指出，關於思想文化的知識，並不可能單從外部的觀察與實驗中獲致：

要了解一門學問，必須很客觀的順隨著這門學問的途徑去弄清楚他的底蘊。……站在門外的人，怎能知道門裡的人是在做甚麼？……〔重要的是〕體認和體驗，是把問題收納在一個人的精神之內，或者是收納在一個人的生活之內，而加以觀察實驗，是把自己的心當作實驗室。³⁸

替之際，許多語詞的使用不可避免地有多義、混亂之狀況。例如，「考據」一詞在不同文脈，可能指傳統考據學方法、傳統考據學範圍或廣義的現代科學方法。參見 Max Weber 著，張旺山譯，《韋伯方法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³⁵ 舉例來說，徐復觀引愛因斯坦的話：「『這是甚麼』的知識，絕不為我們打開直接通向『這應如何』的門」，以此批評毛、勞一切以科學方法為宗的立場，並頌揚「告訴人『應當如何』之〔義理〕之學」的必要性。但愛因斯坦的這句話與實證主義的立場頗為一致，只是表明科學與倫理價值屬不同範疇的知識，絕無支持在學院裡進行道德宣講之意。又如，徐指控：「揭穿了說，治考據就是治考據；把考據吹得滿天飛，這反失掉了考據的本分，這只是欺人之談而已。」但毛、勞本欲跳脫傳統對於考據與義理的定義，而以「考據」指代科學方法。此處，徐只是在文字上糾纏，實無助問題之澄清。徐復觀，〈兩篇難懂的文章〉，頁 9；徐復觀，〈答毛子水先生的「再論考據和義理」〉，頁 11。

³⁶ 關於徐復觀在此論辯中的立場，參見黃俊傑，《東亞儒學視域中的徐復觀及其思想》（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頁 13-17；張崑將，〈徐復觀與當代學者關於「考據」與「義理」之論爭及評議〉，《東吳中文學報》27(2014)：237-266。值得一提的是，2023 年年底國內因中學國文課綱降低文言文比例，引發對於新課綱之「不倫」與「無恥」的批評聲浪。在這類呼籲國文教學應與品格涵養相結合之說法中，我們彷彿聽到徐氏的餘音迴響。

³⁷ 徐復觀，〈答毛子水先生的「再論考據和義理」〉，頁 14；徐復觀，〈考據與義理之爭的插曲（下）〉，頁 12。余英時，《余英時談話錄》，頁 259-261。

³⁸ 徐復觀，〈兩篇難懂的文章〉，頁 9。另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四版（臺北：商務印書館，1978），頁 3-4。

針對這個詮釋學觀點的挑戰，實證學派並沒有在論戰中提出有力的回應。³⁹ 以下我們將看到，這個缺陷會在 1975 年後被余英時與林毓生再次指出。

不論如何，透過回顧考據與義理的論爭，可以發現，至 1950 年代後期，史語所對於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立場，與傅斯年相去無幾，且把實證史學對待義理／思想文化議題的原則說得更細緻，而無反對思想史研究之意。張春樹於史語所七十年所慶時的回憶，可以更進一步佐證，這個立場在當時的史語所是有代表性的：

史語所當時在學術研究與思想方面上都是各派兼容並包，實非如外界所指控只容考據一端。我在所研究學習一年，師長均鼓勵我要多方發展，不能專攻一端。而細查史語所各學者當時所從事之研究，並無一人專以考證資料為是，都為最後的所謂「義理」性的解釋作材料上的輯考打基礎而已，這一點可由他們後來所刊印的著作為證。⁴⁰

此外，張先生也回憶，在前引〈論考據與義理之爭〉的寫作過程，曾將其論點「向史語所內的師長報告，他們並不以我為狂，且加以鼓勵，於是我也再作更進一步的研究。」⁴¹ 這再次反映，將考據與義理視為兩個皆可進行實證研究的史學領域，應是當時所內具代表性的見解。

若我們將目光從方法論辯轉向具體的研究成果，也會得到同樣的結論。在 1950-1975 年間，《史語所集刊》不乏思想文化史領域的論文。以所內研究者而言，

³⁹ 李濟在 1962 年蔡元培九十五歲誕辰紀念會上的演講，強調史家想像力的重要，或許可視為對詮釋學挑戰的回應與讓步：「到現在，歷史這門學問，雖說是已經科學化了；但是，科學的事實，並不能滿足人類普遍的要求，因為，它們是乾燥的，嚴峻的，不能隨着感情轉動的事實。它是沒有血肉的一堆枯骨。把這些事實如何點活？在枯骨上如何加些血肉？不但是科學家的工作，也應該是歷史家更重要的課題。……說得簡單一些，一個歷史家，不但應該根據科學的事實寫歷史，同時也應該用文學的手段寫歷史。……文學家所表現的是另外一種人類生活的事實，說得神秘一點，文學家所描寫的，是：人類的靈魂、他們的情緒，以及喜怒哀樂的變動，不是任何實物所能表現的人類的內心生活。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人類歷史最重要的一面，但却是考古學及其他若干有關的科學，不能找出直接材料的部分。因此，我個人的意見，覺得要預備寫一部中國上古史，我們不但要參照鐵的事實，我們也需要若干活的想像。但是，這個想像力應該是有控制的；換一句話說，我們對於若干科學的事實，不能因為我們的好惡而有所取捨。就是說，無論我們用任何文學手段寫上古史，我們不應該寫出違背存在的科學事實。」李濟，〈附論：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3 (1962)：367-368。

⁴⁰ 張春樹，〈溫舊業、念恩師，附論民國史學——憶史語所學習研究的日子〉，頁 986-987。

⁴¹ 同前揭注，頁 991-992。

黃彰健、嚴耕望、金發根、陳槃、芮逸夫、徐高阮、龍宇純皆有這方面的作品，⁴²而親身參與考據與義理論戰的勞榦更有眾多突出的成果。⁴³可以發現，他們尤其延續傅斯年對於先秦思想的關注。此外，在這段期間，《集刊》的一大特色是以附錄的方式，刊出預計收於《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的文章，其中也有多篇思想文化史論文。⁴⁴雖然作者主要為海外學者，但至少可以證明史語所並不否定該課題的研究價值。

那麼，徐復觀將史語所貶為「『無思想性』之學術機關」，完全是無的放矢嗎？也不盡然。若我們將「思想」限縮在徐復觀所預設的心性義理之學、中國文化之「精神」，則史語所在這方面的史學成果確實有限。而且，隨著兩派論戰的激化，或許更促使所內學者遠離義理之學的歷史研究。關於這點，可以從黃彰健的研究歷程一窺端倪：在 1950 到 1956 年間，他在所內外出版了數篇理學、孟學方面的著作，然而，在接下近二十年的歲月中，他轉而埋首於《明實錄》與明清政治史的考訂，直

⁴² 黃彰健，〈鵝湖之會朱陸異同略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2(1950)：261-265；黃彰健，〈孟子性論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6(1955)：227-308；嚴耕望，〈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兼論書院制度之起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0下(1955)：689-728；金發根，〈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下(1963)：505-558；Ruey Yih-fu, "Li" as Ideal Patterns of Culture in Chinese Tradition,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0下(1969)：815-824；徐高阮，〈山濤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1.1(1969)：87-125；龍宇純，〈正名主義之語言與訓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5.4(1974)：585-598；陳槃，〈春秋時代的教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5.4(1974)：731-812。此外，芮逸夫與陳槃也在其他刊物發表一系列對於古代中國思想文化的討論，包括：陳槃，〈孔子信而好古說〉，《孔孟學報》9(1965)：11-18；陳槃，〈論孟研究論集〉（臺北：黎明文化，1981），頁 287-297；陳槃，〈從左傳中所見到的四夷的文化教育〉，《孔孟學報》20(1970)：29-52；芮逸夫，〈五倫的社會控制觀兼論儒家的禮〉，《社會學刊》第 3 卷(1967)，頁 47-58；芮逸夫，〈中國民族及其文化論稿〉（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下集，頁 637-698。

⁴³ 勞榦，〈孔廟百石卒史碑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上(1962)：99-114；〈六博及博局的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5(1964)：15-30；〈大學出於孟學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8(1968)：277-284；〈「大學出於孟學說」初稿後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8(1968)：429-433；〈六書條例中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3.3(1971)：319-333。

⁴⁴ 作者包括陳榮捷、饒宗頤、梅貽寶、劉子健等思想史專家，所有文章收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中國上古史待定稿》（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5），第四本「兩周篇之二·思想與文化」。感謝王汎森與杜正勝先生告知《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的編纂始末。

李峙線

到 1975 年才再有理學方面的學術著述。⁴⁵ 這樣的研究轉折，很有可能和 1956-1957 年的考據與義理論戰有關。張春樹在前引所慶文章中提到：「現在回憶起來，仍然可從那場論戰中看到當時的政治與學術的關係，也能意識到當時史語所的獨立自由的學風所引起的一些問題。」其實，戰後史語所拒斥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刻板印象，多少可以視為追求思想自由、不屈從主流政治／文化意識形態下所付出的代價。

四 · 1975-1995：世變下的思想文化史研究

重訪新文化運動以來實證史學與思想文化史研究之關聯，或許也能讓我們對於 1975-1995 年間史語所內外的思想史熱潮，產生一些新的理解。當然，此期間史語所先進們在這個領域的豐碩成果，遠非本文所能盡述。以下的討論將聚焦於此時期思想文化史領域的新實踐及其與史語所／新文化運動之史學傳統間的關聯。我想指出的是，由余英時、林毓生、張灝等人所掀起的思想史浪潮，不應被簡單視為西學的又一次輸入；他們對於西方學術的引介，固然讓臺灣學者大開眼界，但他們的研究之所以能在臺灣社會引起廣泛共鳴，也是因為他們承繼並發揚了「思想文化史攸關中國現代化」這個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命題。⁴⁶ 借助西方思想史學的養分，他們重新演繹了這個命題，強調思想與政治在中國歷史上的互動關係，進而暗示思想史研究與當代政治的關聯，成功在劇烈變動的臺灣社會引領風騷。

「民心思變」應該很能概括 1970 年代後期的臺灣社會氛圍。在經濟上，勞力密

⁴⁵ 黃彰健，〈理學的定義、範圍及其理論結構〉，《大陸雜誌》50.1(1975)：1-49；《經學理學文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經今古文學問題新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黃彰健在晚年向王汎森提到：遷臺初期，他曾在楊梅偶遇當時忙於政務與臺大校務的傅斯年，後者對黃在心性之學方面的研究興趣，表示肯定。這再次證明，對於傅斯年來說，實證史學與思想史研究並不衝突。感謝王汎森先生告知這則軼事。

⁴⁶ 應當注意的是，部分受到 1960 年代中西文化論戰的餘波衝擊，在 1970 年代的學院內外對於這個命題的詮釋與發揮，產生出非常多元的觀點與實踐。除了由余英時與林毓生所代表的折衷路線，在文化保守陣營，錢穆、毓璠、胡蘭成（李馨）等人皆有眾多追隨者，在文化激進陣營，臺大歷史系的鄭欽仁與李永熾教授也獨樹一幟。值得一提的是，鄭欽仁畢業自東海大學歷史系，受徐復觀影響尤深。然而，即便對於中國傳統與臺灣現代化的關係有大相逕庭的詮釋，他們都強調思想文化史，他們對於思想史風潮都發揮推波助瀾的效果。感謝王鴻泰先生提醒思想文化史學者內部的多元立場，另參鄭欽仁口述，薛化元、潘光哲、劉季倫訪問，《鄭欽仁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4），頁 16-21；呂妙芬，〈臺灣漢學四十年——裂變與跨界的思想史研究〉，頁 344-345。

集產業開始面臨發展瓶頸、尋求產業升級；而戰後以來出口導向輕工業的成就，壯大了臺灣社會的中產階級，他們在衣食無虞之際，有餘裕思索未來的圖像。科技上，印刷與影印技術的革新，加速知識的流通並實質擴大了出版與言論自由的空間。⁴⁷政治上，一系列的外交失敗使得臺灣人必須面對成為「國際孤兒」的事實，同時鬆動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助長黨外民主化呼聲的氣勢。最後，蔣介石在 1975 年春天的去世，則戲劇性地突顯臺灣所面臨的危機與轉機。這樣的時空下，「臺灣／中華民國的何去何從」產生了空前的求知動能，而中國思想文化史則因緣際會地成為尋求解答的重要手段。

1976 年初，甫卸下新亞書院院長之職、返美執教的余英時，在《聯合副刊》發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引起知識界與公眾輿論的熱烈迴響。這個艱澀的思想史課題所以能在臺灣社會掀起滔天巨浪，除了得力於後者風雨飄搖、民心思變的處境，也緣於該文巧妙地延續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史學辯論，並提出新意。⁴⁸ 它的題材明顯承襲民初的新史學傳統，藉回顧古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尋求當代現代化／民主化的解方。然而，在激進反傳統與文化保守之間，這篇文章則另闢蹊徑：一方面，余英時承繼文化激進派的自由主義理念，批判傳統中國的政治與學術文化。他的分析取徑也明顯受到西方現代史學的影響。「反智論」是借自英文概念 (anti-intellectualism)，而對於學術思想與現實政治之互動的關注，則繼承了英國觀念論哲學家柯靈烏 (R. G. Collingwood) 所啟發的脈絡主義方法 (contextualism)。但在另一方面，余英時絕無以西方現代價值為宗，全盤否定中國傳統之意。相反地，該文強調先秦儒家的「重智性」，而直指「儒家的法家化」才是詛咒中國政治黑暗的幽靈。該文的核心問題是解釋儒家傳統的「重智性」與現實專制政治的「反智性」間的歷史矛盾。這個問題意識其實與新儒家學者十分相近。⁴⁹ 此外，該文是一篇論述中國傳統的通史之作。這種暗示中國文化有延續性、有其精髓的寫作手法，較常為文化保守派史家所採用，而非文化激進派實

⁴⁷ 王汎森，「思潮·無國界 天才還會不會群聚而來？」，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訪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RCz3MdiyY>（檢索時間：2023.09.10）。

⁴⁸ 關於余英時自青年時代以來因五四反傳統論述而生的困擾與知識探索，見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18），頁 121-124。

⁴⁹ 如徐復觀曾謂，當代中國人的重要使命是「把中國文化從歷史的專制政治的污泥中澄汰出來，使其以人性純白之姿……向人類呼喚」。徐復觀，《徐復觀文錄選粹》，頁 197，轉引自黃俊傑，《東亞儒學視域中的徐復觀及其思想》，頁 16。

李峙線

證史家的路數。

同時期，林毓生對於五四運動的研究，也指出反傳統思想的盲點，並由此闡釋「創造地轉化」中國傳統的重要性。他設想，思想史研究將促進「儒家道德理想主義與西方自由人文主義的新整合」，完成新文化運動的未盡之業——讓「自由個人主義……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識裡生根」。⁵⁰ 可以說，余英時與林毓生都繼承了新文化運動激進派的現代化使命，希望在中國落實西方的個人主義價值與民主法治；但是，他們比胡適和傅斯年更加肯定中國傳統，而對「思想文化史攸關中國現代化」這個命題提出新的詮釋——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建立在對於傳統思想文化的同情理解與適當評價。⁵¹

此外，不可忽略的是，余英時與林毓生對於中國傳統與現代化的看法，亦有西方漢學的脈絡。自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以降，「近代中國為什麼在科學知識上落後於歐洲？」、「近代中國為何停滯？」成為西方漢學家的核心問題意識；而受現代化理論影響，美國漢學的領導者如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 咸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不但是中國落後於歐洲的主要理由，也成為近代中國追求現代化過程中的絆腳石。⁵² 余、林認為傳統在中國現代化之路上扮演重要角色之立場，也是一種對於歐洲中心論之反動。⁵³

那麼，這條思想文化史的新路線又與史語所的實證史學傳統有怎樣的關聯呢？顯而易見的是，他們對於文化激進主義的反省批判，也延伸到他們看待實證史學的態度。在這點上，他們幾乎照單全收徐復觀對於實證史學的批評。余英時認定傅斯年引導近代中國史學走向「一個值得惋惜的發展」；實證學派「深信史學可以而且必須完全客觀化」的代價是：

將思想的因素完全排除於歷史之外；不但史家個人的主觀思想不許混入史學研究之內，而且歷史上已經客觀存在過的抽象東西如精神、價值觀之類也一

⁵⁰ 林毓生，〈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中外文學》3.12 (1975)，修訂版收錄於《思想與人物》，頁 196。

⁵¹ 余英時，《余英時談話錄》，頁 174-175。

⁵²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64-67.

⁵³ 余英時，〈序〉，《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2），頁 iii；林毓生，〈不以考據為中心目的之人文研究〉，《幼獅月刊》41.3 (1975)，收錄於《思想與人物》，頁 273-274。陳正國，《什麼是思想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4），第十一章。

律要劃出史學範圍之外。⁵⁴

林毓生則回到他赴美留學前夕的「考據」與「義理」之辯，呼應徐復觀對「考據派」的指控。林毓生指出：

「考據」與「義理」不能相提並論。一個是邊緣性的工作，一個是核心的工作。⁵⁵

而後一工作的目標是：

(1) 尋求人的意義；(2) 使我們今天自己的人生、社會與時代變得更豐富而有意義。⁵⁶

要之，他們對於實證學派的批評，可歸為三點：第一，將研究思想文化史排除於史學工作。第二，忽略社會目的與現實關懷。第三，以為史學即史料學，以為史學可以完全排除個人主觀，以致於追求「客觀的歷史真實」之幻影。

乍看之下，余英時與林毓生所鼓吹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似乎可視作對於實證史學的全面批判；但細查之，則會發現他們與實證史學的實際距離並不如表面上的遙遠。首先，根據本文前二節的討論，他們第一與第二點的批評都有商榷的餘地。傅斯年與後繼的史語所學者絕非不研究「抽象東西」或思想、義理，這點無庸再贅述。次就社會目的言，傅斯年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並不是外於社會脈絡、追求抽象真理的行動；如前所述，他之所以反常地結合實證史學與思想文化史，正是出於明確的社會目的——欲排除心學與史學混淆下所形成的現代化文化障礙。至於文化激進派在戰後以降遁入象牙塔之舉，也難一概歸因於實證方法論，而毋寧是在威權政治與文化保守主義結盟下，明哲保身的政治性選擇。總之，就史學研究與中國現代化之關聯，余、林的立場其實與實證學派相去不遠，都認為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余英時與林毓生對於實證史學最根本性的挑戰，當在第三點，亦即對史學客觀性的反省；在這方面，余英時的論述又更為全面。申言之，他對於實證史學方法論的兩個原則皆不滿意：一方面，關於史家的價值中立性問題，余英時認為，史學論述不可能脫離史家的主觀價值預設；史學的科學客觀性是建立在史家對於自身預設與多元觀點的自覺，而不是排除自己的主觀。⁵⁷ 另一方面，他不認為靠客觀材料

⁵⁴ 余英時，〈自序〉，《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頁9-10。

⁵⁵ 林毓生，〈不以考據為中心目的之人文研究〉，頁268。

⁵⁶ 同前揭註，頁267。

⁵⁷ 余英時，〈史學、史家與時代〉，《歷史與思想》，頁257-260。

的蒐集排列就足以呈現歷史人物的主觀思想。就此議題，他特別借助柯靈烏的史學觀點，強調史學研究的對象不是單純的「事件」(events)，而是「行動」(actions)；行動的根源是個人內在的「思想過程」(process of thought)，而這樣的思想過程非透過史家主觀的「詮釋」(interpretation) 與「想像」(imagination)，不足以還原。⁵⁸

特別是余英時針對柯靈烏哲學的發揮，為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明確的方法指引。根據柯靈烏之說，歷史的本質是個人的思想與行動，而史學的目標是「重新設身處地去體會古人的思想」。⁵⁹ 這樣的設想對於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實作，至少有兩方面的影響：首先，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焦點由概念與學說轉向個人。同情地理解歷史人物之意圖與行動，成為正當的史學課題。再者，為探求思想與行動背後的意圖，歷史人物所處的政治與社會脈絡更形關鍵。相較於概念與學說的抽象辯證與演繹，更重要的是思想者如何為追求特定的價值與利益而發展政治與道德論述、思想者與其同儕團體的論述脈絡、思想者的經濟及日常生活等問題。

在此，容我再次回到傅斯年的史學。的確，上述對於史學客觀性之質疑與脈絡主義的倡議，十足暴露出傅斯年及其追隨者所宣揚之實證史學的限制。然而，回到傅斯年本人複雜的思想，可以發現，他對這些限制其實頗有意識；換言之，傅斯年與余英時對於思想文化史的本質與做法，並不如表面看起來的遙遠。首先，我們不應從字面來理解傅斯年所追求的客觀歷史；對他而言，客觀真實的追求是一種提醒、一種對傳統學術的批判，而不是一個可以達到的目標。他在晚年曾公開表示：

想以客觀為理想而去努力，尚且弄得不客觀，一旦完全把客觀放棄了，認為是不可能的，不需要的，……以為一切社會的方法都是從某一主觀的法規，這對於社會科學之進步，當然是一個大障礙了。……誠然，談社會科學，是離不了社會的立點……但從各種不同角度看，主觀性可以漸漸減少……用多元主義代替主觀主義，也許是現在社會科學方法論上一個迫切的要求。⁶⁰

這個態度與余英時強調史家對自身立場的自知之明是一致的。

其次，傅斯年其實也注意到思想家之意圖與其思想間的重要關聯，進而認為共

⁵⁸ 余英時，〈一個人文主義的歷史觀〉，《歷史與思想》，頁 227-229, 233-236。

⁵⁹ 同前揭註，頁 229。

⁶⁰ 傅斯年，〈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社會科學論叢」發刊詞〉，《傅斯年全集》第 4 冊，頁 364-365。另見杜正勝，〈新史學基地的剖析〉，收於氏著，《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2004），頁 285-289；Axel Schneider 著，關山、李貌華譯，《真理與歷史：傅斯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頁 166-168。

時性的外在社會脈絡，比歷時性的內在思辨理路來得更重要。在前引傅斯年歸國前給胡適的信中，他犀利地指出，

中國的些方術論者⁶¹……大大多數是些世間物事的議論者，其問題多是當年的問題……古代方術家與他們同時的事物關係，未必不比他們和宋儒的關係更密。轉來說，宋儒和他們同時的事物之關係，未必不比他們和古代儒家之關係更密——所以才有了誤解的注。所以以二千年之思想為一線，而集論之，亦正未必有此必要。⁶²

受限於其時代與經歷，傅斯年未能完整地發展他的思想文化史研究法，但從諸多面向看來，他與余英時在中國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上，有類似的心得。事實上，余英時本人對於傅斯年與胡適之生命與學術的興趣，也反映出余英時對於實證史學的承繼可能多於揚棄。⁶³ 而他們同樣處於史學與世變的關鍵時刻，可以部分解釋這個跨世代的共鳴。

當然，余英時與林毓生對於思想文化史方法的討論，遠比傅斯年深刻廣博。他們對於實證史學之限制以及人物意圖與歷史脈絡之重要性的意識，也比傅斯年及其追隨者來得更為清晰。這些體系性而有洞見的論述，不只突顯中國思想史中許多未被開發的園地，也為 1980 年以降臺灣瞬息萬變的政局提供更深刻的解讀觀點。更重要的是，他們躬身實踐其方法論述，寫成數部論證嚴謹卻又富有現實關懷的經典作品。這些作品為一代的臺灣知識青年奠定學識基礎，並開啟他們對於思想文化史的熱忱與興趣。⁶⁴ 在他們當中，不少人將在 1980、1990 年代進入史語所工作，

⁶¹ 傅斯年拒絕使用源自西方的「哲學家」，而以「方術論者」來指稱中國具類似關懷的思想者。

⁶² 傅斯年，〈致胡適 (1926.08.17)〉，頁 45-46。

⁶³ 王汎森回憶，選擇以傅斯年之思想為博論主題，是由於余英時的積極建議。由此可見余對傅斯年史學思想之興趣與肯定。王汎森，〈偶思往事立殘問……當時只道是尋常，向余英時老師問學的日子〉，《如沐春風：余英時教授的為學與處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頁 20。

⁶⁴ 陳正國，〈臺灣史學中的余英時身影〉，《當代》232 (2006)：34-51；黃克武，〈五四與反五四的「內在融合」：余英時先生的胡適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通訊》31.4 (2021)：19-20。思想史研究在臺灣青年學子間所引起的漣漪效應，可以《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系列套書為證。該系列收錄海內外學者的近代中國思想史論著，尤其包括林毓生、余英時、張灝、汪榮祖、列文森、史華慈、艾愷、Paul A. Cohen 等知名美國學人的著作，而負責這些作品之編譯與評介的是以本土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生為骨幹的團隊，包括：周陽山、楊肅獻、周婉窈、陳弱水、李孝悌、劉靜貞、朱雲漢等人。周陽山、楊肅獻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五

並成為思想文化史領域的領導者。

1975年不只標誌臺灣社會的轉型，對史語所而言，也是一個轉捩點。從這一年開始，新人招聘漸趨頻繁，尤其在1980年「五年計畫」正式執行後，史語所更是大量晉用新血。⁶⁵ 這波人事浪潮，也為史語所帶來出色的思想文化史研究者，包括：陳鴻森（1982）、黃進興（1983）、康樂（1983）、王汎森（1985）、朱鴻林（1989）、陳弱水（1993）、祝平一（1995）、李孝悌（1997），其中有超過半數曾為余英時或林毓生的指導學生。

這批充滿活力的研究者為《史語所集刊》帶來一番新的氣象。就斷代言，1975年以前，史語所的文化思想史研究多關注於古代中國，而上述作品則以中國中古以後為主、尤其集中於明清的發展。就課題言，相較於過往以學說傳承、學案論爭、概念與字詞之演變等核心的討論，新的研究趨勢包括：第一，以個別人物思想及其時代為主題的研究，如陳弱水的〈思想史中的杜甫〉；第二，考察學術思想與現實政治的交互作用，如黃進興的〈理學、考據學與政治：以《大學》改本的發展為例證〉與〈道統與治統之間：從明嘉靖九年（1530）孔廟改制談起〉、朱鴻林的〈明儒湛若水撰帝學用書《聖學格物通》的政治背景與內容特色〉、康樂的〈轉輪王觀念與中國中古的佛教政治〉；第三，從更廣泛的社會生活與知識活動，探討思潮學風之趨向與變遷，如王汎森的〈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與〈清初的講經會〉。⁶⁶ 而他們基於新取徑而寫成的研究專著，更成為中、英文學界中國思想文化史領域的經典之作。⁶⁷

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

⁶⁵ 在1980-1997年間，史語所新聘了56位研究人員。杜正勝，〈新史學基地的剖析——史語所七十年〉，頁282。

⁶⁶ 陳弱水，〈思想史中的杜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1（1998）：1-43；黃進興，〈理學、考據學與政治：以《大學》改本的發展為例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0.4（1989）：889-916；黃進興，〈道統與治統之間：從明嘉靖九年（1530）孔廟改制談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4（1990）：917-941；朱鴻林，〈明儒湛若水撰帝學用書《聖學格物通》的政治背景與內容特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2.3（1993）：495-530；康樂，〈轉輪王觀念與中國中古的佛教政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109-143；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3（1993）：679-712；王汎森，〈清初的講經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3（1997）：503-588。

⁶⁷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5）；《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87）；Jo-Shui Chen, *Liu Tsung-yü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五·1995-2020：文化思想史研究室與新文化史的興起

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1975 年以降中國思想文化史領域的興起，有賴於史學與世變的交相輝映，然而，該領域的成熟與專業化卻又拉開了它與政治的距離。解嚴前夕，王汎森在大作《古史辨運動的興起》結論道：古史辨運動「固然幫助後來的史家衝破過去無數的迷霧，可是，在倒洗澡盆時也把嬰兒倒掉了。現在，是將嬰兒從地上撿回來的時候了！」我推測，王先生的意思是，中國現代史學家所懷抱的強烈政治意識，使他們在推動史學革命的同時，葬送了史學專業所追求的公正與抽離。⁶⁸ 這個「撿回來的嬰兒」將牽引 1990 年代後期以降思想文化史研究在史語所內外的發展。

1995 年，史語所「思想文化史研究室」成立，或可視為這個領域在臺灣史學界邁向成年的里程碑。研究室的創始成員包括：朱鴻林、黃進興、陳弱水、盧建榮、陳鴻森、祝平一，並由王汎森擔任召集人。根據成立計劃，它的目標除了促進所內的「集眾」研究，也希望成為史語所與所外、海外同行的交流與合作平台，一起開拓新問題、蒐集新材料。具體而言，研究室計畫邀請所內外學者進行不定期報告、組織工作坊專題討論，並有研究室專門刊物的出版規劃。⁶⁹

「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第一個專題計畫訂為「傳統士大夫的生活、思想與信仰」，從中我們已可察覺 1995 年以後，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新動向。質言之，文化精英的社會關係與歷史世界等外在脈絡受到更進一步的重視；這些具體的生活實踐不只被視為重新理解學術變遷的重要線索，重建該生活實踐本身逐漸被認為就是極具價值的研究課題。

從此時期兩次以文化思想史為主軸的史語所歷史研習營活動內容，尤其可見此一研究趨勢。1995 年第四屆歷史研習營的主題是「中國思想與社會」，從其中的

China, 773-81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4）；Chin-Shing Huang, *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Fan-Sen Wang,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⁶⁸ 王汎森在該書序言也引用余英時對文革「影射史學」之批評：「當任務最迫切的時候，史學上的一切求知的戒律都將被棄置不顧了。」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頁 297, 12。

⁶⁹ 〈史語所思想文化史研究室成立計劃〉(1995)。感謝王汎森先生提供珍藏檔案。

幾個講題，如「討論思想與社會的幾個連結點」（王汎森）、「試探中古時代有關婦女行為與地位的規範系統」（陳弱水）、「從文化思想到社會行動」（李孝悌），可以發現，對於社會生活的興趣，大致是出於更深刻、更全面理解抽象思想的動機。⁷⁰ 然而，到了 2003 年，第十二屆研習營的各專題演講，則明顯淡化思想面的問題意識，文化精英的社會生活本身就是研究主題。例如，黃進興的「士人與孔廟」、邱仲麟的「冰與明清北京的日常生活」、王鴻泰的「明清人士生活與文人文化」、巫仁恕的「晚明士大夫的旅遊文化」皆反映這樣的傾向。⁷¹ 可以說，在世紀之交，史語所的文化思想史者要回答的問題，從「文化精英的日常生活跟他們的思想間有甚麼關聯？」轉為「如何描述文化精英的日常生活？」⁷²

事實上，1999 年李孝悌接任召集人後，研究室易名為「文化思想史研究室」，研究者所欲解答之問題的優先順位，可見一斑。在李先生的領導下，研究室集結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兩次中研院三年期主題計畫，催生在明清士人與城市生活領域的眾多傑出作品，並定期於世界各地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為青壯學者提供一個伸展發揮的國際舞台。⁷³ 關於這兩次主題計畫的成果與學術意義，王鴻泰在兩篇專文

⁷⁰ <http://www.ihp.sinica.edu.tw/~ihpcamp/activity/04.html>（檢索時間：2023.09.10）。關於這個立場，王汎森有精要地說明：「二十幾年前，當我開始撰寫這方面的論文時，我的史學觀念是這樣的：就思想論思想是思想史的根本工作，但同時思想史應該廣泛地與許多領域相結合，我的想像是思想之於社會就像血液透過微血管運行周身，因此，它必定與地方社群、政治、官方意識形態、宗教、士人生活……等複雜的層面相關涉，故應該關注思想觀念在實際生活世界的動態構成，並追尋時代思潮、心靈的複雜情狀。」王汎森，〈序〉，《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 1。余英時在 1980 年代後期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是這個取徑的指標性作品。

⁷¹ <http://www.ihp.sinica.edu.tw/~ihpcamp/activity/12.htm>（檢索時間：2023.09.10）。

⁷² 李孝悌本人的研究歷程也具體地反映這樣的變化，他在 1980 年代主要關注於政治與教育的理念與實踐，而在 1990 年代後逐漸轉向討論士人生活與城市日常。見 Hungtai Wang, “從經國濟民到聲色犬馬”, p. 28.

⁷³ 第一次主題計畫題為「明清的社會與生活」（2001-2003），由王汎森、李孝悌共同主持，參與成員包括：王正華、王鴻泰、巫仁恕、邱仲麟、胡曉真、馬孟晶、劉錚雲、賴惠敏；第二次主題計畫題為「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2006-2008），由李孝悌主持，參與成員包括：王鴻泰、巫仁恕、邱仲麟、邱澎生、胡曉真、陳熙遠、費絲言、賴惠敏。在第二次主題計畫的三年間，研究團隊分別在哈佛大學、史語所與法國遠東學院巴黎總部，召開「中國城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已有精湛的說明，不容筆者於此再多贅言。⁷⁴ 以下，僅從本文主題——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傳統——對「社會文化史的轉向」提出兩個補充性的觀察。

首先，1999 年以後的「社會文化史轉向」與上一代思想文化史家的現世關懷有明顯差距。如前所述，1970 年代的思想史浪潮，有賴於史學與世變的緊密互動；診斷中國文化、進而摸索兼容中國傳統與現代民主的生活方式，是思想史研究引起臺灣學界內外廣泛共鳴的根本原因。然而，世紀之交的明清城市文化研究者逐漸遠離了這個問題意識。從李孝悌對於兩次主題計畫的介紹中可知，新的史學實踐主要是受到年鑑學派社會生活史與新文化史的啟發，而貫串各研究的核心問題意識，是藉西化前的中國城市生活，突顯歐洲中心論式之現代化論述的局限，指出 Fernand Braudel、Max Weber 等人所描繪的現代城市化歷程並非歐洲的獨特現象。⁷⁵ 對於新一代的研究者來說，重建傳統中國的城市生活——尤其是攸關品味、逸樂、情色、奢靡等日常庸俗課題的主觀世界——是研究的主要目的，它們容或有理解傳統中國的政治經濟與道德理念，但研究者顯然無意由此回應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的現代化之路為何崎嶇難行？」、「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將何去何從？」等困惑與紛爭。這樣的變化除了是西方思潮與史學專業化的結果，可能也與此期間臺灣主體意識增長、中國認同淡薄的趨勢有關。⁷⁶

不過，應予注意的是，由史語所領導的明清城市文化史研究也絕非全然獨立於過往思想文化史研究傳統的新典範。事實上，新的研究方向仍部分承繼了既有的研究慣習；其中最顯著者，就是新的研究課題仍環繞在士大夫與知識分子的生活世界。按歐美年鑑學派與新文化史學風而言，他們通常承繼社會史的底層關懷與對於社會支配階層的批判，而他們所關注的「日常生活文化」通常不是文化精英的「雅文化」；芸芸眾生的慣習與情感、庸俗世界的符號象徵與儀式，才是多數歐美新文化史家想要詮釋的對象。⁷⁷ 然而，在臺灣本土的新文化史實踐，則無明顯的左派情

⁷⁴ Hungtai Wang, “從經濟民到聲色犬馬”, pp. 18-37; 王鴻泰, 〈從骨骼到血肉與精神的發育〉, 頁 285-333。

⁷⁵ 李孝悌, 〈明清的社會與生活：計畫簡介〉, 《漢學研究通訊》20.2 (2001): 54-57; 李孝悌, 〈「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計畫簡介〉, 2006, 網頁資料: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811043314/http://citylife.sinica.edu.tw:80/intro.htm> (檢索時間: 2023.04.23)。

⁷⁶ 陳正國, 〈臺灣史學中的余英時身影〉, 頁 48-49。

⁷⁷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3-14.

李峙線

懷。回顧上述兩次主題計畫，雖然社會各階層的生活百態皆被納入研究範圍，但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才是多數研究成果的交集之處。⁷⁸ 的確，這樣的傾向或許與可用之史料有關——明清底層社會的文字史料較少，而 1990 年代正值中國大陸大規模重刊明清文集之際——研究者並非不欲探討明清底層生活，不能矣。然若回到歐洲史學的脈絡，則又顯示此一解釋的限制。畢竟，從年鑑學派到新文化史書寫，歐美史家多半也是仰賴間接性的記錄；缺乏當事人留下的直接證言，無礙於他們再現黎民黔首的喜怒哀樂。易言之，史料的限制，恐怕不是史家選題的根本理由。若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我們或許可以說，明清社會文化史研究的斐然成就，是西方新興史學嫁接在新文化運動以降思想文化史主幹上的獨特果實；而延續新枝與老幹的節點，是歷代中國史研究者對於中國士大夫傳統的興味與愛恨情懷。

六· 結論與展望

綜上所述，本文主張，自創所以來，史語所歷代學者對於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興趣從未中斷，而這樣的學術興趣——至少在 1995 年以前——與中國現代化問題緊密交織。對傅斯年而言，以實證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思想，是為了正本清源地檢驗心學傳統的創設神話，同時建立科學的學術文化，從基礎上為中國現代化鋪路。這樣的立場為史語所戰後的一代所承繼。相較於徐復觀，他們確實沒有產生影響廣泛的思想史作品。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輕視思想文化史研究，毋寧是他們不合時宜的文化激進觀點與對實證史學的堅持，使他們傾向避免將學術工作與民族大義混為一談，進而被不當地貼上了「考據派」的標籤。1975 年以後，余英時與林毓生等人掀起的思想史熱潮，逐漸改變所內研究的格局與風貌，在研究方法（以人物、脈絡而非概念、學說為中心）、研究時段（重中古、明清甚於古代）上，皆與所內過去的典範有別；然而，余、林的號召力相當程度上應歸功於他們對於「思想文化史研究攸關中國現代化」此一命題的延續與再詮釋——中國現代化的先決條件是對於傳統思想文化的同情理解與適當評價。1995 年以後，隨著新文化史的興起，正式截斷了思想文化史研究與中國現代化等「經國濟民」式關懷的連結，但新一代研究者對於士大夫文化的共同興趣，又透露出所內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不變關懷。

⁷⁸ 李孝悌，〈明清的社會與生活：計畫簡介〉，頁 54。

思想文化史研究在 1928-1950、1975-1995 年所以在臺灣學界與公眾間產生廣泛的影響力，關鍵在於研究者的問題意識與當代的政治與文化脈動密切交織。1990 年代以來的專業化追求，不可避免地使社會公眾對於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興趣衰退。⁷⁹ 然而，就算回到新文化運動、中國自由主義的問題意識，顯然也不足以讓思想文化史研究與 1990 年代以後之臺灣社會共舞。一方面，新的國族認同切斷了臺灣社會與新文化運動的連結；⁸⁰ 另一方面，臺灣在政治與文化上已經跨出許多步，而不再困擾於「中國為何無法發展自由主義？」、「現代中國如何創造性地轉化傳統？」等概括性問題；更甚者，面對全球化浪潮下的各種挑戰，當代臺灣恐怕也難以從中國思想文化，尋求關於性別認同、個人自由與家庭傳統、貧富差距、族群融合等複雜問題的解方。

持平而論，至 2020 年，在臺灣人文學界，思想文化史若非走下神壇，至少可謂身陷諸神鬥爭之中。⁸¹ 思想文化史研究應該嘗試呼應當代臺灣問題嗎？思想文化史領域如何吸引更多青年才俊？筆者不敢妄下斷語。⁸² 以下僅略述近年來在史語所內兩方面的新嘗試與新發展，或將有助我們思考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未來。

首先，可以發現，不少所內學者皆著力於摸索在思想史與新文化史之間——以王鴻泰的話來說，是在「經國濟民」與「聲色犬馬」之間——的其他可能。「知識史」(history of knowledge) 或許是一個較能用來涵括這些嘗試的概念。簡言之，相較新文化史，知識史更集中關注於知識活動；然而，不同於傳統思想史，知識史關注知識的形式甚於知識的內容。它的核心問題意識是資訊與知識生產、流通、保存與管理的變遷及其效應。研究者企圖爬梳的是知識驗證的步驟、知識傳播的媒介

⁷⁹ 王汎森，「思潮·無國界 天才還會不會群聚而來？」，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訪談，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RCz3MdiyY>（檢索時間：2023.09.10）。

⁸⁰ 林毓生在與史華慈的對談中提到：「每當我回顧五四時代，想到中國自由主義式與激烈的反傳統思想密切地聯繫著，而當時卻沒有一種藉著對於儒家思想創造地闡釋與改造來支持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我便深感悲哀，並覺得歷史在嘲弄中國。」這樣的悲憤及其所激起的知識熱情，恐怕難在當代臺灣找到共鳴。〈史華慈、林毓生對談錄〉，收錄於林毓生，《思想與人物》，頁 452。

⁸¹ 呂妙芬對國內歷史系所的思想史領域課程、碩博論文與博士畢業就業狀況進行量化分析，指出「從 1990 年代後期開始，中國思想史領域呈現快速衰退的態勢」。不過，此處的趨勢僅限於思想史，呂妙芬也指出同期間新文化史的蓬勃發展。呂妙芬，〈臺灣漢學四十年——裂變與跨界的思想史研究〉，頁 337-343。

⁸² 就此，呂妙芬提出了寶貴的觀察與建言，見呂妙芬，〈臺灣漢學四十年——裂變與跨界的思想史研究〉，頁 366-367。

與管道、知識保存與展示的方法、知識人的訓練機制等議題。於是，知識史研究者一方面從編排形式、分類方法、出版流程等新問題，檢視重要傳統文獻；另一方面，則將焦點轉向過往思想史所忽略的知識與訊息媒介，如尺牘、唱和詩文集、譜牒、契約、帳簿、家庭百科、地圖、學校、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來重建時人的知識觀與知識網絡。具體而言，祝平一、邱仲麟、王鴻泰、陳熙遠、戴麗娟、張谷銘、陳雯怡、李仁淵、孔令偉、童永昌等先進同仁皆有精彩論著。⁸³ 近年來，文化思想史研究室也陸續舉辦以知識史為主題的讀書會與工作坊，以摸索組織整合型研究的可能。⁸⁴

其次，從上述論著可以發現，相較於「社會文化史轉向」集中在明清中國研究，

⁸³ 祝平一，〈作者、編者、剽竊者：從《晰微補化全書》看醫書的抄輯與作者身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3 (2021)：561-602；Ping-yi Chu, "Philological Arguments as Religious Suasion: Liu Ning and His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Martin Hofmann, Joachim Kurtz and Ari Daniel Levine, eds., *Powerful Arguments: Standards of Valid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 2020), pp. 503-527；邱仲麟，〈從會館、廟寓到飯店、公寓——北京指南書旅宿信息的近代化歷程〉，《北京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第7輯，頁3-75；王鴻泰，〈明清城市生活中的訊息傳播與媒體形式〉，《國學研究》45 (2020)：229-262；王鴻泰，〈學屬對規器識——明清士人的啟蒙教育、對句練習與文人性格的形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4.2 (2023)：369-427；陳熙遠，〈聖人之學即眾人之學：從《鄉約鐸書》與明清鼎革之際的群眾教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4 (2021)：701-778；Li-chuan Tai, "The Shanghai Museum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axidermy and habitat dioramas into China, 1874-1952," *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48.1 (2021): 111-130；Ku-ming (Kevin) Chang, "For the Love of the Truth: The Dissertation as a Genre of Scholarly Public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KNOW: A Journal on the Formation of Knowledge* 5 (2021): 113-166；Wen-yi Chen, "When Literati Beg: Informal, Voluntary, and Collective Support in Song and Yuan Presentation Prefaces,"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8 (2019): 139-171；Ren-yuan Li, "Necessary Knowledge for Young Students and the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17th to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 *Asia Major* 35.2 (2022): 1-56；李仁淵，〈元、明刊《居家必用》與家庭百科的誕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3 (2021)：509-560；孔令偉，〈蘇寧阿《萬里回疆圖》與十八世紀後期清朝的新疆地理知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4.3 (2023)：573-651；孔令偉，〈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圖測繪與世界地理知識之傳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3 (2021)：603-648；Yung-chang Tung, "Confronting the Job Shortag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Personnel Information in Song China,"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8 (2019): 57-98.

⁸⁴ 「作為論述與行動的教育：教育史研究的新取徑與新課題工作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2021.11.26；「知識的跨境與感染：知識史工作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2023.12.19。

新研究不論在時間與空間上都更為廣闊，這個現象與近來所內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第二個趨勢密切相關，亦即，對跨境思想文化交流的關注。這個趨勢無疑是受到全球史熱潮的啟發，希望跳脫「核心—邊緣」、「衝擊—回應」等西方中心論與民族本位視角，來重新描述塑造現代世界的多元動力，以及中國／東亞在全球現代化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⁸⁵

全球史學的興起為臺灣的思想文化史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國際舞台，從更普遍的視角，使中國／東亞文化及其現代化經驗對非東亞研究者產生意義。與此同時，在臺灣各界普遍意識到全球化的龐大力量與臺灣在全球網絡中之重要地位的今天，思想文化史的全球轉向似乎又開啟了史學研究與當代社會的連結契機。史學研究應該維持超然獨立？還是應該回應當代關懷？這些問題想必將繼續困擾著未來的思想文化史研究者，並將決定思想文化史研究與社會公眾的關係。

⁸⁵ 本所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繁多，茲舉最近期的作品：Jen-der Lee, Chih-hung Chen, "EUMENOL—Merck's Patent Emmenagogue and Its Chinese Connections (1896-1961),"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irstview, 2023): 1-23；祝平一，〈正教與異端：明、清時期「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注疏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1.2 (2020)：187-226；陳正國，〈蘇格蘭啟蒙思想中的中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4.3 (2023)：653-713；戴麗娟，〈十九世紀初澳門不列顛博物館的歷史意義：兼論英、印、中自然史資訊流通網絡的運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1.3 (2020)：519-577；Ku-ming (Kevin) Chang and Alan Rocke, eds., *A Global History of Research Education: Institutions, Disciplines, and Nations, 1840-19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Yuen-Gen Liang, "Hidden Subjectivities in Objective Measures: Spanish Perceptions of Geographic Space in North Africa," *Pedralbes: Revista d'Història Moderna* 40 (2020): 185-208；藍弘岳，〈「帝國」概念在漢文圈的翻譯與流傳：從幕末日本到清末中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3.1 (2022)：213-272；Albert Wu, "Superstition and Statecraft in Late Qing China: Towards a Global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255.1 (2022): 279-316；Charles C. H. Lee, "The New Liberals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Idealist Philosophy, Evolutionary Sociology, and the Quest for a Humanitarian Ethics in Edwardian Britain,"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20.4 (2023): 1142-1164.

引用書目

一· 近人論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

- 1985 《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第4本「兩周篇之二·思想與文化」，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孔令偉

- 2021 〈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圖測繪與世界地理知識之傳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3：603-648。
2023 〈蘇寧阿《萬里回疆圖》與十八世紀後期清朝的新疆地理知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4.3：573-651。

毛子水

- 1951 〈傅孟真先生傳略〉，《自由中國》4.1：16。
1956 〈論「考據」與「義理」〉，《中央日報》1956.12.04。
1987 〈再論「考據」與「義理」〉，《中央日報》1957.03.12。

王汎森

- 1985 《章太炎的思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987 《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1993 〈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3：679-712。
1997 〈清初的講經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3：503-588。
2004 《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3 《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4 《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三聯書店。
2019 《如沐春風：余英時教授的為學與處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020 〈錢穆與民國學風〉，《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臺北：允晨文化公司，頁175-222。

王鴻泰

- 2020 〈明清城市生活中的訊息傳播與媒體形式〉，《國學研究》45：229-262。

- 2021 〈從骨骼到血肉與精神的發育：四十年來 (1980-2020) 臺灣明清社會史的回顧與展望〉，耿立群主編，《深耕茁壯—臺灣漢學四十回顧與展望》，臺北：國家圖書館，頁 285-333。
- 2023 〈學屬對規器識——明清士人的啟蒙教育、對句練習與文人性格的形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4.2：369-427。
- 朱鴻林
- 1993 〈明儒湛若水撰帝學用書《聖學格物通》的政治背景與內容特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2.3：495-530。
- 余英時
- 1976 《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1987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1992 《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2000 〈學術思想史的創建及流變——從胡適與傅斯年說起〉，《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1-12。
- 2016 〈《民主評論》新儒家的精神取向——從牟宗三的「現世關懷」談起〉，收於彭國翔著，《智者的現世關懷：牟宗三的政治與社會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 23-34。
- 2017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頁 209-251。
- 2018 《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 余英時口述，李懷宇整理
- 2021 《余英時談話錄》，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 呂妙芬
- 2021 〈臺灣漢學四十年—裂變與跨界的思想史研究〉，《深耕茁壯—臺灣漢學四十回顧與展望》，臺北：漢學研究中心，頁 335-368。
- 李仁淵
- 2021 〈元、明刊《居家必用》與家庭百科的誕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3：509-560。
- 李永熾
- 2019 《邊緣的自由人》，臺北：游擊文化。
- 李孝悌
- 2001 〈明清的社會與生活：計畫簡介〉，《漢學研究通訊》20.2：54-57。

李峙線

李濟

- 1962 〈附論：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3：367-368。
- 1951 〈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所長紀念特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11-19。
- 1956 〈試論中國文化的原始〉，《中央日報》1956.10.02。

杜正勝

- 2004 〈新史學基地的剖析——史語所七十年〉，收於氏著，《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頁 285-289。

沈剛伯

- 1968 〈史學與世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0：509-517。

周陽山、楊肅獻主編

- 1980 《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五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林毓生

- 1983 《思想與人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芮逸夫 (Ruey, Yih-fu)

- 1967 〈五倫的社會控制觀兼論儒家的禮〉，《社會學刊》3：47-58。
- 1969 “‘Li’ as Ideal Patterns of Culture in Chinese Tradition.”《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0 下：815-824。
- 1972 《中國民族及其文化論稿》下集，臺北：藝文印書館。

邱仲麟

- 2018 〈從會館、廟寓到飯店、公寓——北京指南書旅宿信息的近代化歷程〉，《北京史學》第 7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3-75。

金發根

- 1963 〈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 下：505-558。

施耐德 (Schneider, Axel) 著，關山、李貌華譯

- 2008 《真理與歷史：傅斯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韋伯 (Weber, Max) 著，張旺山譯

- 2013 《韋伯方法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徐高阮

- 1969 〈山濤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1.1：87-125。

徐復觀（筆名李實）

- 1957a 〈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上）〉，《人生》169：2-5, 24-25。

- 1957b 〈有關思想史的若干問題（下）〉，《人生》170：8-15。
- 1957c 〈兩篇難懂的文章〉，《民主評論》8.1：3-9。
- 1957d 〈答毛子水先生的「再論考據和義理」〉，《民主評論》8.8：9-15。
- 1967 〈致李濟之先生一封公開信〉，《徐復觀雜文補編》第2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頁336。
- 1978 《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商務印書館。
- 1991 〈寫給中央研究院王院長世杰先生的一封信〉，收於氏著，《徐復觀文存》，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頁260。
- 祝平一
- 2020 〈正教與異端：明、清時期「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注疏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1.2：187-226。
- 2021 〈作者、編者、剽竊者：從《晰微補化全書》看醫書的抄輯與作者身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3：561-602。
- 康樂
- 1996 〈轉輪王觀念與中國中古的佛教政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1：109-143。
- 張春樹
- 1957 〈論義理與考據之爭〉，《中央日報》1957.08.06。
- 1998 〈溫舊業、念恩師，附論民國史學——憶史語所學習研究的日子〉，《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990-991。
- 張崑將
- 2014 〈徐復觀與當代學者關於「考據」與「義理」之論爭及評議〉，《東吳中文學報》27：237-266。
- 許冠三
- 1996 《新史學九十年·下冊》，臺北：唐山出版社。
- 陳正國
- 2006 〈臺灣史學中的余英時身影〉，《當代》232：34-51。
- 2023 〈蘇格蘭啟蒙思想中的中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4.3：653-713。
- 2024 《什麼是思想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陳拱
- 1957a 〈論考據與義理的關係以及義理之驗證（上）〉，《民主評論》8.22：540-42。

李峙線

- 1957b 〈論考據與義理的關係以及義理之驗證（下）〉，《民主評論》8.23：579-582。

陳弱水

- 1998 〈思想史中的杜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1：1-43。
- 2022 〈殷海光與 1940、50 年代的自由主義——殷海光歷史位置的一個探討〉，《思與言》60.3：10-61。

陳槃

- 1965 〈孔子信而好古說〉，《孔孟學報》9：11-18。
- 1970 〈從左傳中所見到的四夷的文化教育〉，《孔孟學報》20：29-52。
- 1974 〈春秋時代的教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5.4：731-812。
- 1981 《論孟研究論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陳熙遠

- 2021 〈聖人之學即眾人之學：從《鄉約鐸書》與明清鼎革之際的群眾教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4：701-778。

傅斯年

- 1926 〈致胡適 (1926.8.17)〉，收錄於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卷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頁 45-46。
- 1927 〈評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1.2：18-20。
- 1928a 〈周頌說——附論魯南兩地與詩書之來源〉，《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95-112
- 1928b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3-10。
- 1930 〈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一個短記〉，《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227-230。
- 1936 〈誰是「齊物論」之作者？〉，《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557-567。
- 1998 〈天問之史料性〉，《古今論衡》1：109-124。

傅斯年，傅孟真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編，陳槃等校訂增補

- 1980 《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勞榘

- 1956 〈歷史的考訂與歷史的解釋〉，《中央日報》1956.11.06。

- 1957 〈論中國國故學上的分工〉，《中央日報》1957.01.22。
- 1962 〈孔廟百石卒史碑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上：99-114。
- 1964 〈六博及博局的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5：15-30。
- 1968a 〈大學出於孟學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8：277-284。
- 1968b 〈「大學出於孟學說」初稿後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8：429-433。
- 1971 〈六書條例中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3.3：319-333。
- 黃克武
- 2019 〈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的糾結：1950年代港台朝野的五四論述〉，《思想史》9：217-264。
- 2021 〈五四與反五四的「內在融合」：余英時先生的胡適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通訊》31.4：19-20。
- 黃俊傑
- 2009 《東亞儒學視域中的徐復觀及其思想》，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黃進興
- 1989 〈理學、考據學與政治：以《大學》改本的發展為例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0.4：889-916。
- 1990 〈道統與治統之間：從明嘉靖九年（1530）孔廟改制談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4：917-941。
- 1994 《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 黃彰健
- 1950 〈鵝湖之會朱陸異同略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2：261-265。
- 1955 〈孟子性論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6：227-308。
- 1975 〈理學的定義、範圍及其理論結構〉，《大陸雜誌》50.1：1-49。
- 1976 《經學理學文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1982 《經今古文學問題新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萬先法
- 1957 〈考據、義理與學術精神〉，《民主評論》8.24：11-7。

李峙線

鄭欽仁口述，薛化元、潘光哲、劉季倫訪問

2004 《鄭欽仁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

錢穆

1992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龍宇純

1974 〈正名主義之語言與訓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5.4：585-598。

戴麗娟

2020 〈十九世紀初澳門不列顛博物館的歷史意義：兼論英、印、中自然史資訊流通網絡的運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1.3：519-577。

藍弘岳

2022 〈「帝國」概念在漢文圈的翻譯與流傳：從幕末日本到清末中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3.1：213-272。

羅家倫

1956 〈喚起學術的興趣促進思想的交流——為學人創刊而寫〉，《中央日報》1956.10.02。

嚴耕望

1955 〈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兼論書院制度之起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0下：689-728。

蘇瑞鏘

2011 〈《民主評論》的新儒家與《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關係變化初探：以徐復觀與殷海光為中心的討論〉，《思與言》49.1：7-44。

顧頡剛

1927 〈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1.1：1-7。

Chang, Ku-ming (Kevin) (張谷銘)

2021 “For the Love of the Truth: The Dissertation as a Genre of Scholarly Public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KNOW: A Journal on the Formation of Knowledge* 5: 113-166.

Chang, Ku-ming (Kevin) (張谷銘) and Alan Rocke, eds.

2021 *A Global History of Research Education: Institutions, Disciplines, and Nations, 1840-19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Jo-Shui (陳弱水)
1992 *Liu Tsung-yü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n, Wen-yi (陳雯怡)
2019 “When Literati Beg: Informal, Voluntary, and Collective Support in Song and Yuan Presentation Prefaces.”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8: 139-171.
- Chu, Ping-yi (祝平一)
2020 “Philological Arguments as Religious Suasion: Liu Ning and His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Powerful Arguments: Standards of Valid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Martin Hofmann, Joachim Kurtz and Ari Daniel Levine. Leiden; Boston: Brill, pp. 503-527.
- Cohen, Paul A.
1984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Chin-Shing (黃進興)
1995 *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nt, Lynn ed.
1989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Iggers, Georg G.
1997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Lee, Charles C. H. (李峙皞)
2023 “The New Liberals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Idealist Philosophy, Evolutionary Sociology, and the Quest for a Humanitarian Ethics in Edwardian Britain.”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20.4: 1142-1164.
- Lee, Jen-der (李貞德), Chih-hung Chen
2023 “EUMENOL—Merck’s Patent Emmenagogue and Its Chinese Connections (1896-1961).”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irstview, 2023): 1-23.
- Li, Ren-yuan (李仁淵)
2022 “Necessary Knowledge for Young Students and the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17th to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 *Asia Major* 35.2: 1-56.

李峙線

Liang, Yuen-Gen (梁元禎)

- 2020 “Hidden Subjectivities in Objective Measures: Spanish Perceptions of Geographic Space in North Africa.” *Pedralbes: Revista d’Història Moderna* 40: 185-208.

Tai, Li-chuan (戴麗娟)

- 2021 “The Shanghai Museum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axidermy and habitat dioramas into China, 1874-1952.” *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48.1: 111-130.

Tung, Yung-chang (童永昌)

- 2019 “Confronting the Job Shortag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Personnel Information in Song China.”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8: 57-98.

Wang, Fan-Sen (王汎森)

- 2000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UNY Press.

Wang, Hungtai (王鴻泰)

- 2011 “從經濟民到聲色犬馬——二十年來臺灣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Ming Studies* 63: 18-37.

Wu, Albert (吳孟軒)

- 2022 “Superstition and Statecraft in Late Qing China: Towards a Global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255.1: 279-316.

二・網路資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研習營」網站

<https://www.ihp.sinica.edu.tw/~ihpcamp/index.htm>，2023.09.10 檢閱。

王汎森

- 2021 「思潮·無國界 天才還會不會群聚而來？」，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訪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RCz3MdiyY>)，2023.09.10 檢索。

李孝悌

- 2006 〈「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計畫簡介〉，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計畫網站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811043314/http://citylife.sinica.edu.tw:80/intro.htm>)，2023.04.23 檢索。